

洛阳汉魏陵墓研究论文集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编

文物出版社

北京·2009 年

封面设计 周小玮
责任印制 陈 杰
责任编辑 王 伟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洛阳汉魏陵墓研究论文集/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编.
北京: 文物出版社, 2009. 10
ISBN 978-7-5010-2842-9

I. 洛… II. 洛… III. 汉魏洛阳城-陵墓-文集
IV. K878.8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9) 第 167794 号

洛阳汉魏陵墓研究论文集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编

*

文 物 出 版 社 出 版 发 行

(北京市东直门内北小街2号楼)

邮 政 编 码 : 1 0 0 0 0 7

<http://www.wenwu.com>

E-mail: web@wenwu.com

达利天成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新 华 书 店 经 销

889 × 1194 1/16 印张: 14.25

2009 年 10 月第 1 版 2009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010-2842-9 定价: 150.00 元

洛阳考古二十年（代前言）

史家珍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

我们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的前身是洛阳地区文物工作队。1986年8月，洛阳地区与洛阳市进行区划调整，洛阳地区文物工作队更名为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至今已度过了二十个年头。这二十年正值我国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迅猛发展的大好时期。我们这支在古都洛阳从事文物考古的专业队伍不断发展壮大，在文物考古领域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展示着我们的丰采。

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是洛阳市文物局下属的事业单位，与洛阳市文物工作队共同担负着洛阳辖区内的文物保护、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任务。我队建队伊始，只有14名工作人员，业务力量薄弱，图书资料缺乏，办公条件简陋，各方面的工作面临着重重的困难。但是全体同志在中共洛阳市委、市政府和市文物局的领导下，在国家文物局、河南省文物局和全国同仁的大力支持下，本着“队兴我荣，队衰我耻”的艰苦创业精神，齐心协力，奋发图强，经过二十年的艰苦奋斗，已经得到了全面的发展。

我队现有职工46人，其中有研究员1名，副研究员4名，馆员9名，大专以上学历的人员占全队总人数的85%以上。队内下设考古部、技保部、研究室、办公室和保卫科五个职能部门，专业门类较为齐全。并拥有现代交通、信息、摄影、安防技防等设备。专业图书资料从零起步，发展到现在拥有《四库全书》、《丛书集成》、《古今图书集成》以及各类考古书籍、报刊杂志共3万余册。办公地点原来是一栋宿办合一的小楼，1991年新建了六层办公大楼，2006年6月又迁入位于洛南新区的文博大厦，办公条件得到了极大的改善。

搞好古都洛阳的文物保护、考古发掘和科学研究，是我们的基本职责。以洛阳为中心的河洛地区是华夏文明的摇篮。我国历史上的夏、商、西周、东周、东汉、曹魏、西晋、北魏、隋、唐、后梁、后唐、后晋等十三个朝代，在洛阳建都长达1500余年。自裴李岗文化到北宋末年的七千多年间，这里的文明进程长期处于全国乃至世界的领先或前列地位。千年古都的文化积淀，使邙山上下、伊洛之滨蕴藏着丰厚的文物瑰宝。在东西二十多公里内分布着偃师二里头夏都遗址、偃师汤都西亳遗址、东周王城遗址、汉魏洛阳故城遗址和隋唐洛阳城遗址，以“五都贯洛”的宏伟气魄，记载着古都洛阳的沧桑巨变。邙山上无数帝王将相、才子佳人的墓冢，以其高大的封土和众多的碑志石刻诉说着古都洛阳的历史故事。面对如此丰厚的文化遗产，我们既感到文物工作者肩

负的重大责任，又感到能在古都洛阳从事文物考古工作的无比荣幸。

1986年—2006年二十年间，我们完成基本建设考古项目约467个，发掘西周至明清时期墓葬7800余座，发掘新石器至隋唐时期遗址3万平方米。其中战国时期墓葬约1300座，两汉墓葬约5900座，宋墓260余座，还有少量的两周、秦、魏晋、元、明、清墓葬，出土各类文物27000余件。1998年配合小浪底水库建设，调查和测绘了黄河小浪底八里胡同古栈道，在新安县盐东村发掘了汉函谷关大型建筑遗址，被评为1998年全国十大考古发现之一，荣获1996—1998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三等奖，河南省文物局考古发掘特别奖。1999年—2004年，参加长江三峡库区的考古发掘工作，先后对奉节洋安渡遗址、巫山胡家包墓群、万州柑子梁墓群、奉节三台崖墓群、丰都丁庄和大地坝遗址进行了发掘，发掘周至明清时期墓葬100余座，揭露新石器至明清时期遗址17000余平方米，出土各类文物近6000件。

为了加强文物保护和科学研究，我们还完成了许多辖区内的主动的考古调查、发掘、勘测项目。1989年—1993年调查、勘测、试掘宜阳韩国故城遗址，通过4年的工作对这一战国时期的重要都城遗址的布局及内涵有了全面的认识。1997年—2003年，我们分别对隋唐东都西苑遗址、洛阳地区隋唐离宫遗址、周山东周王陵、汉函谷关遗址、洛阳地区唐代石雕塔、徐家营宋金古桥进行了考古调查。全面顺利地完成了调查任务，多数项目完成后还撰写发表了相关的简报、论文。2002年5月经国家文物局批准，我们承担国家级的考古项目“洛阳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工作。这个项目的第一阶段工作已经基本完成，取得了重要收获。同时，我们还积极参与国内、国际间的考古合作。1999—2000年参加了中意合作发掘龙门奉先寺遗址的钻探发掘工作，钻探遗址3000平方米，发掘面积1100平方米。2000年我们应深圳市宝安区文化局邀请，对该区的10个镇、街道办，约733平方公里区域内的地上和地下文物进行普查，发现古文化遗址23处，地上文物527处。

我们以古都洛阳的考古发现为基础，深入开展学术研究。多年以来我队狠抓人才培养，努力营造学术氛围，大力支持业务研究，造就了一支国内外都较有影响的学术队伍，涌现出一批科研成果。建队以来编辑、撰写和出版了考古报告和学术专著25部，主要有《甲骨金文与古史研究》、《画像砖石刻墓志研究》、《洛阳考古发现与研究》、《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甲骨金文与古史新探》、《洛阳汉墓壁画》、《洛阳新获墓志》、《中国文物旅游丛书》（全套十册）、《洛阳钱币发现与研究》、《洛阳出土北魏墓志选编》、《中国新石器时代考古文献目录》、《河南旧石器》、《洛阳名碑集释》等。其中，我队学者蔡运章先生担任总纂的《中国钱币大辞典·先秦编》，是国家“八五”古籍整理重点项目，该书于1995年由中华书局出版发行，受到学术界的高度评价。这部著作和《洛阳考古发现与研究》一起荣获1998年第二届中国钱币学最高奖“金泉奖”。我们还在各类学术刊物发表论文、考古简报共310余篇，不断反映和总结我们的考古发现和科学研究。

我们以古都洛阳为平台，积极开展学术交流活动，加强同国内、国际文物考古界的联系。自1991年以来，我们先后举办或承办了7个全国及国际学术会议。这些学术会议有全国河洛文明学术研讨会、中国夏商文明国际学术研讨会、全国夏文化学术研讨会、中国第三届西周文明国际学

术研讨会、小浪底汉函谷关仓库建筑遗址学术讨论会、中国文字起源学术研讨会、邙山陵墓群考古调查与勘测工作方案座谈会等。同时出版《河洛文明论集》、《夏商文明研究》、《夏文化研究论集》、《西周文明论集》等学术专著。这些学术活动和科研成果，促进了我国文物考古事业的发展，受到了国内外学术界的高度赞誉。

二十年在人类历史上只是短暂的一瞬间。我们得天时地利之便，在文物考古领域内虽然取得了一些成就，但是无论与全国兄弟单位相比，还是与古都洛阳的历史地位相比，特别是从现实中华民族振兴所赋予我们的使命来看，我们做的还远远不够，今后的工作任重而道远。但是我们有信心，随着伟大祖国的和平发展，我们这支队伍必将为我国的文物考古事业做出更大的贡献。

《中国文物报》2006年11月1日

目 录

洛阳考古二十年(代前言)	史家珍(1)
西汉帝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刘庆柱 李毓芳(1)
我国古代墓葬名称考略	蔡运章 赵晓军(28)
论秦汉陵墓的从葬之制	王学理(34)
谈谈汉代帝陵制度变化的几个阶段	马永赢(48)
论西汉梁王陵的墓地布局与墓葬形制结构	王良田(57)
东汉帝陵有关问题的探讨	韩国河(63)
东汉帝陵变制原因探析	韩国河(74)
东汉诸侯王墓考古发现与研究	刘振东(79)
从陵到冢——关于东汉“懿陵”的思考	杨哲峰(88)
东汉帝陵封土考辨	蔡运章(92)
“陂池”——东汉帝陵封土的新形制	严 辉(96)
邙山东汉帝陵地望的探索之路	严 辉(100)
东汉帝陵有关陪葬墓问题的思考	卢青峰(107)
焦作市汉献帝史迹调查报告	罗火金(114)
北魏永固陵的调查与探讨	张庆捷(122)
北魏帝陵后陵方位研究	赵振华 余扶危(134)
魏晋时期赠赙制度探讨	张鸿亮(149)
洛阳地区汉墓所见“多人葬”问题——以烧沟和西郊墓群为中心	杨哲峰(180)
长安地区秦、汉、西晋时期中小型墓葬的演变	肖健一(190)
城墓分离：洛阳古代城市史上的重大转折	霍宏伟(198)
从两方唐代墓志探索两座皇后陵	李健超(209)
大同北魏太官粮窖遗址出土的战国秦汉瓦当	张喜斌 王普军 徐国栋(212)

西汉帝陵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刘庆柱 李毓芳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

一 西汉帝陵考古发现史

关于西汉帝陵的研究,很早已经引起人们的关注。自汉代以后,不少历史地理文献记载了西汉帝陵,如《三辅黄图》、《三秦记》、《关中记》、《水经注》、《长安志》、《关中胜迹图志》等,其中尤以北魏酈道元《水经注》记述的西汉帝陵方位及其与周边关系最为详尽。至于对西汉帝陵的考古调查,则是随着近代考古学传入中国之后而出现的。日本学者足立喜六于1906~1910年,应聘在西安的陕西高等学堂任教习,其间对西汉帝陵进行了考古调查、勘测。上个世纪30年代,在足立喜六出版的《长安史迹研究》中介绍了上述内容。与足立喜六同时,日本学者关野贞、法国学者E. E·沙畹和V. 色伽兰等,也对西汉帝陵进行了考古调查。1942~1943年,由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央博物馆筹备处等单位合组的西北史地考察团,调查了关中地区的西汉帝陵。此后,20世纪70年代初,考古工作者开始了对西汉帝陵进行全面考古调查,1974年发表了考古调查的初步成果^①。20世纪60~70年代,先后对一些帝陵及陪葬坑、陪葬墓、刑徒墓地进行了考古发掘^②;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中期开展的西汉帝陵考古调查、勘探与汉宣帝杜陵陵园遗址考古发掘工作,取得了重大进展^③;20世纪90年代以来的汉景帝阳陵考古发现^④,促进了西汉帝

① 咸阳地区文物管理委员会编:《咸阳地区历史文物概况》第27~42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74年。

② 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咸阳市博物馆:《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彩绘陶俑》,《文物》1966年第3期;王学理、吴镇烽:《新安任家坡汉陵从葬坑的发掘》,《考古》1976年第2期;茂陵保管所王志杰、陕西省博物馆朱捷元:《汉茂陵及其陪葬冢附近新发现的重要文物》,《文物》1976年第7期;陕西省文管会等:《咸阳杨家湾汉墓发掘简报》,《文物》1977年第10期;秦中行:《汉阳陵附近钳徒墓的发现》,《文物》1972年第7期。

③ 杜葆仁:《西汉诸陵位置考》,《考古与文物》1980年第1期;刘庆柱、李毓芳:《西汉诸陵调查与研究》,《文物资料丛刊》(第六辑),文物出版社,1982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陵工作队:《1982~1983年西汉杜陵的考古收获》,《考古》1984年第10期;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杜陵工作队:《1984~1985年西汉宣帝杜陵的考古工作收获》,《考古》1991年第12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

④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阳陵考古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一号简报》,《文物》1992年第4期;《汉景帝阳陵南区从葬坑发掘第二号简报》,《文物》1994年第6期;《汉景帝阳陵考古新发现》,《文博》1999年第6期;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汉阳陵》,重庆出版社,2001年;焦南峰:《试论西汉帝陵的建设理念》,《考古》2007年第11期。

陵的考古学研究。近年来开展的汉惠帝安陵、汉昭帝平陵、汉武帝茂陵等西汉帝陵的考古调查、勘探及试掘，又为西汉帝陵研究提供了新的考古发现资料^①。

通过多年来的西汉帝陵考古工作，现在已经可以基本究明西汉帝陵的情况：西汉时代有十一座帝陵，它们分成两大陵区，即咸阳原陵区和长安东南陵区，其中以咸阳原陵区为主。两大陵区均位于都城长安附近。每个皇帝及其皇后的陵墓又形成独立的大陵园，汉文帝霸陵及其后的大陵园之中，又包括有帝陵与皇后陵各自的陵墓封土及陵园。大陵园之中有陪葬坑、寝殿与便殿组成的寝园、陵庙等，大陵园（之外）附近有帝陵的陪葬墓、刑徒墓、陵邑等（图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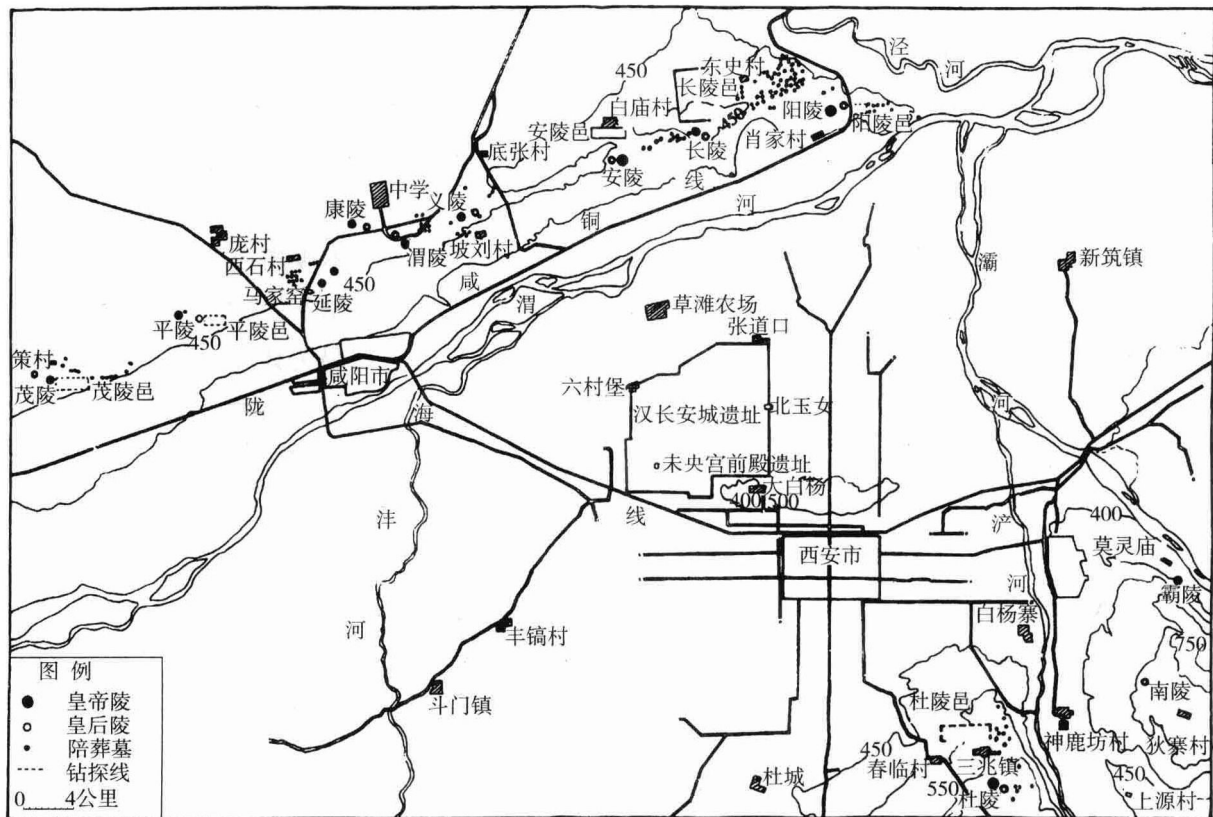


图1 西汉帝陵分布图（《西汉十一陵》第2页，图1；《汉杜陵陵园遗址》第3~4页，图一）

二 西汉帝陵及陵园遗址的考古发现与研究

（一）西汉帝陵的分布

《周礼·春官·冢人》载：“冢人掌公墓之地，辩其兆域而为之图。”东周时代的中山国

^①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安安陵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2年第4期；汉平陵考古队：《巨型动物陪葬少年天子》，《文物天地》2002年第1期；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昭帝平陵钻探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5期；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武帝茂陵钻探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年第6期。

国王墓曾出土一件兆域图铜版^①。尽管至今还未发现汉代的兆域图，但汉代及其以后的帝陵修建，应该继承了这种先秦制度是没问题的。类似中山国王陵“兆域图”功能的“图纸”，在汉代帝陵修建中可能也会有的。汉代学者郑玄在为《周礼·春官·冢人》兆域之图作注时称：“图谓之画其地形及丘垄所处而藏之者。谓未有死者之时，先画其地之形势，豫图出其丘垄之处。”

象西汉时代以前王朝的帝陵或王陵一般葬于都城、王城附近一样，西汉一代十一个皇帝均葬于都城长安附近。其实这种帝陵埋葬制度一直与中国古代社会相始终，目前考古究明最早的王陵——安阳西北岗商代王陵位于商代都城殷墟北部，中国古代最后的两个王朝——明清王朝的帝陵（明十三陵和清东陵、清西陵）就在都城北京附近。

关于西汉时代各个帝陵的地望，根据历史文献记载，结合考古调查资料，学术界一般认为咸阳原上渭北陵区的西汉帝陵，自西向东依次为汉武帝茂陵、汉昭帝平陵、汉成帝延陵、汉平帝康陵、汉元帝渭陵、汉哀帝义陵、汉惠帝安陵、汉高祖长陵和汉景帝阳陵，东西绵延近百里。长安城东南陵区有汉文帝霸陵和汉宣帝杜陵^②。但是清代所立西汉诸陵石碑标识和相关地方县志记载与此有所不同^③，近年也有学者对咸阳原上的西汉晚期的延陵、康陵、渭陵和义陵的地望排序提出不同看法^④。

西汉十一陵分为两个陵区，可能与古代的昭穆制度有关。昭穆制度被认为是礼制的核心内容，丧葬礼仪是礼制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昭穆制度作为秦汉时代宗庙礼仪的基本制度时，“阳间”社会折射的“阴间”——墓葬，同样对于基本的礼仪制度也要执行，不过由于其墓葬（尤其是陵区、陵园）较宗庙“载体”的“庞大”，昭穆制度在空间的反映方面，则表现得比较宽泛。汉代人认为：“父为昭，子为穆，孙复为昭，古之正礼也。”^⑤ 西汉皇帝属于昭位者有高祖、景帝、昭帝、宣帝、成帝；属于穆位者有惠帝、文帝、武帝、元帝、哀帝和平帝。从西汉帝陵分布中，可以看出，辈份相同者，因其昭穆序位相同，死后不能葬在同一陵区。如惠帝和文帝皆为高祖之子，均属于穆位。惠帝安陵在长陵之旁，文帝只能另辟陵区于渭河之南。辈分不同，属于隔辈者继位，由于其昭穆序位相同，死后也不可能葬在同一陵区。如宣帝为昭帝堂孙，二帝均为昭位，宣帝刘询继昭帝刘弗陵而为皇帝，因此宣帝不能在咸阳原西汉帝陵陵区预建寿陵，而陵址选在长安城东南的杜东原上。哀帝和平帝俱为元帝庶孙，均属于穆位，但王莽篡汉以后仍将其女婿汉平帝康陵置于咸阳陵区，这可能是王莽故意违背西汉王朝礼仪的特例。

在咸阳原上的西汉陵区，可分为三个小陵区，即东部的西汉初期高祖长陵、惠帝安陵和景帝阳陵陵区；西部的西汉中期武帝茂陵和昭帝平陵陵区；中部的西汉晚期元帝渭陵、成帝延陵和哀

① 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虘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

②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③ 毕沅：《关中胜迹图志》；《咸阳县志》。

④ 王建新：《西汉后四陵名位考察》，《古代文明》第2卷，第304~327页，文物出版社，2003年。

⑤ 《汉书·韦贤传》，第3118页。

帝义陵（包括平帝康陵）陵区。东部陵区以长陵为祖位，安陵位西，阳陵居东，形成昭东穆西排列。西部陵区以茂陵和平陵为穆西昭东排列。由于文帝时在灊、渭汇流的渭河北岸修建了祭祀神明的渭阳五庙，后来景帝又于长陵和渭阳五庙间筑阳陵，因此在咸阳原上的西汉帝陵区不可能再向阳陵以东延伸。

关于西汉帝陵分布，也有学者认为它们与昭穆排序无关^①，西汉时代“左昭右穆的礼制已不通行”^②。

西汉帝陵陵区（咸阳原陵区）分布范围东西达百里，这种规模在西汉时代以前帝王陵中是不曾有过的。现在已究明的殷墟侯家庄发现的商王陵区共有8座王陵，其范围东西450米、南北250米^③，这一面积不及西汉帝陵陵区中一座帝陵陵园的占地面积。帝陵陵园、陵区的扩大，其主要原因有五：一是陵墓规模变大；二是陵寝建筑的大规模营建；三是大量陪葬墓的安葬；四是众多陪葬坑的设置；五是陵邑的建设。西汉帝陵陵区、陵园的扩大，基于帝国时代皇权的强化与突出，依托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国家支配能力的加强。

西汉前期的高祖长陵、惠帝安陵和景帝阳陵在西汉长安城正北，这种帝陵与都城南北相对的方位设计，反映了当时设计者将帝陵与都城作为“阴阳二界”统一体的观念。

（二）西汉帝陵封土、地宫的考古勘查与研究

战国时代晚期，王陵的封土已出现规模明显变大，如齐临淄、赵邯郸、秦芷阳等地的王陵，均有高大封土。战国时代王陵的高大封土出现，是因为受到古人“事死如事生，事亡如事存”的影响^④。王陵的封土形制则是受到当时盛行的高台宫殿建筑的影响^⑤。封土规模反映了战国时代流行“宫室之量，器皿之度，棺槨之厚，丘封之大，此以大为贵也。”^⑥秦始皇陵将战国时代陵墓“以大为贵”发展到极至。

西汉帝陵和皇后陵封土平面形制早期为长方形，也就是文献记载中的“坊”形^⑦，如汉高祖长陵帝陵封土底部东西约159~160米、南北约126~129米，吕后陵封土东西150~155米、南北124~125米^⑧；汉惠帝安陵帝陵封土东西170米、南北140米。大约从汉文帝以后，

① 这一观点的代表性文章有：时瑞宝：《西汉帝陵与昭穆之序》，《中原文物》1987年第1期；雷依群：《论西汉帝陵制度的几个问题》，《考古与文物》1998年第6期；焦南峰、马永赢：《西汉帝陵无昭穆制度论》，《文博》1999年第5期；黄展岳：《西汉陵墓研究中的两个问题》，《文物》2005年第4期；赵化成：《从商周“集中公墓制”到秦汉“独立陵园制”的演化轨迹》，《文物》2006年第7期。

② 叶文宪：《西汉帝陵的朝向分布及相关问题》，《文博》1988年第4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殷墟的发现与研究》，科学出版社，1994年。

④ 《礼记·中庸》，《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629页，中华书局，1982年。

⑤ 《吕氏春秋·安死》载：“设阙庭，为宫室，造宾阼也若都邑”。

⑥ 《礼记·礼器》，《十三经注疏》（下册）第1433页，中华书局，1982年。

⑦ 《礼记·檀弓》：“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见封之若堂者矣，见若坊者矣。”郑玄注：“坊形旁杀平上方而长。”《十三经注疏》（上册）第1292页，中华书局，1982年。

⑧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汉长陵、阳陵GPS测量简报》，《考古与文物》2006年第6期。

西汉一代的帝陵和皇后陵封土平面一般均为近方形，即“覆斗形”，也就是文献记载的“堂”形^①，如：孝文窦皇后陵封土底部东西 137 米、南北 143 米；汉景帝阳陵帝陵封土边长 158 ~ 159 米，孝景王皇后陵封土边长 151 ~ 158 米^②；汉武帝茂陵帝陵封土底部东西 224 ~ 226 米、南北 228 ~ 236 米，李夫人陵封土底部东西 114 米、南北 131 米^③；汉昭帝平陵帝陵（西部的陵）封土边长 160 米，宣昭上官皇后陵（东部的陵）封土边长 150 米；汉宣帝杜陵帝陵封土边长 172 米，孝宣王皇后陵封土边长 148 米；汉元帝渭陵帝陵封土边长 175 米，孝元王皇后陵封土边长 90 米；汉成帝延陵帝陵封土边长 173 米，孝成班婕妤陵封土底部边长 80 米；汉哀帝义陵帝陵封土底部边长 175 米，孝哀傅皇后陵封土底部东西 100 米、南北 85 米；汉平帝康陵帝陵封土底部东西 216 米、南北 209 米，孝平王皇后陵封土底部边长 86 米。西汉帝陵封土高一般为 30 米左右，也有个别超出常制的，如汉武帝帝陵封土高 46.5 米，汉惠帝、汉元帝和汉平帝的帝陵封土高 25 ~ 26.6 米^④。

与皇帝合葬的皇后陵墓封土，其形状与帝陵封土基本相同，但是二者封土规模多不同，一般帝陵大于皇后陵封土。也有少数帝陵与皇后陵封土规模相近者，如汉高祖长陵和吕后陵封土高分别为 32.8 米与 30.7 米。皇后陵墓的封土一般高 25 米左右，西汉晚期汉元帝至汉平帝的各皇后陵封土规模进一步变小^⑤。

西汉帝陵的墓室称“方中”，未进行过考古发掘，从现已获得的汉太上皇陵、汉景帝阳陵（包括帝陵和皇后陵）、汉武帝帝陵、孝昭上官皇后陵、汉宣帝杜陵（包括帝陵和皇后陵）考古调查、勘探资料来看，帝陵与皇后陵的墓室四面居中位置各有一条墓道，西汉前期的帝陵四条墓道有明显主次之分，南、北、西三条墓道大小相近，东墓道大于上述三条墓道，应为主墓道。如汉太上皇陵的东墓道长 82 米（仅为封土以外的墓道长度），其余 3 条墓道封土以外长为 31 ~ 34 米^⑥；汉景帝帝陵东西南北四个墓道长分别为 69 米、21 米、17 米和 23.1 米。西汉时代中晚期帝陵的 4 条墓道形制、大小基本相同，如：孝昭上官皇后陵（东部的陵）的东西南北四条墓道长分别为 66 米、76 米、60 米和 51 米^⑦，汉宣帝帝陵的东西南北四个墓道长均为 20 米（封土以外部分）^⑧。从目前已知考古资料来看，西汉帝陵继承了商代晚期以来王陵地宫设四条墓道、平面为“亚”字形墓的传统形制。

① 《礼记·檀弓》：“昔者夫子言之曰：吾见封之若堂者矣。”郑玄注：“封筑土为垄堂形四方而高。”《十三经注疏》（上册）第 1292 页，中华书局，1982 年。

② 《礼记·中庸》，《十三经注疏》（下册）第 1629 页，中华书局，1982 年。

③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汉武帝茂陵钻探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 年第 6 期。

④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⑤ 以上关于西汉帝陵封土的数据，除已注明出处者外，均引自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 年。

⑥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栌阳发掘队：《秦汉栌阳城遗址的勘探和试掘》，《考古学报》1985 年第 3 期。

⑦ 咸阳市文物考古研究所：《西汉昭帝平陵钻探调查简报》，《考古与文物》2007 年第 5 期。

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 年。

(三) 西汉帝陵陵园及门阙遗址的考古勘查、发掘与研究

1. 西汉帝陵陵园的勘查

帝王陵墓设置陵园早于战国时代已出现,如河北平山县中山国国王墓出土“兆域图”铜版之上有陵园墙^①,河南辉县固围村魏国王陵^②、邯郸赵国王陵考古发现的陵园遗址^③,秦国的凤翔秦公陵中陵园多以隍壕为界^④,芷阳的秦王陵和临潼的秦始皇陵之陵园则筑墙为界^⑤。西汉帝陵继承了秦始皇陵筑墙为界的做法。

西汉初年,沿袭了战国以来的传统,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陵的皇帝和皇后的陵墓在同一个陵园之内。汉高祖长陵陵园平面为方形,边长780米,陵园四角置角楼,汉高祖陵墓在吕后陵墓西北280米。汉惠帝安陵陵园东西940米、南北840米,汉惠帝陵墓与孝惠张皇后陵墓东西相距270米。从汉文帝霸陵开始,皇帝与皇后的陵墓各自筑成一座陵园。孝文窦皇后陵园现在仍然保存;文献记载汉文帝霸陵陵园有东阙^⑥,这个“东阙”如果是汉文帝帝陵陵园门阙,证明汉文帝时帝陵陵园与皇后陵园已经各自营筑陵园;如果是汉文帝霸陵的包括帝陵陵园和皇后陵园的“大陵园”东阙,更说明汉文帝时帝陵与皇后陵各自营筑陵园,并且于其外又筑“大陵园”将汉文帝帝陵陵园与孝文窦皇后陵园包于其中。20世纪80年代中期,有的学者已经根据《汉书·外戚传》指出,在皇帝陵园和皇后陵墓陵园之外,还应存在包容帝、后二陵园的大陵园^⑦。近年来西汉帝陵的考古勘探,已经证实了这一推断。如汉景帝阳陵陵园遗址考古勘探发现,陵园平面长方形,四面各有一门。在此陵园之中有帝陵陵园、皇后陵园,还有陵庙建筑等礼制建筑和陪葬坑。阳陵陵园居中位置有东西向与南北向道路各一条,连至陵园四门。帝陵陵园约位于阳陵陵园居中位置,阳陵陵园四门与帝陵陵园四门相对,其间有道路相连。帝陵陵园基本位于阳陵陵园的“中心”位置。皇后陵园在帝陵陵园东北部。阳陵的陪葬墓主要分布在阳陵陵园之外的北部和东部,陵邑在阳陵东部陪葬墓区以东^⑧。刑徒墓地在阳陵陵园之外的西北部,墓地区面积约8万平方米^⑨(图2)。

目前汉文帝霸陵及以后西汉时代诸帝陵陵园与皇后陵陵园的位置、形制,已经基本究明。帝陵与皇后陵陵园平面形制一般均为方形,陵园每面中央各辟一门。如阳陵、茂陵、平陵、杜陵、渭陵、延陵、义陵和康陵帝陵陵园,边长分别约为418米、430米、370米、433米、400~410米、382~400米、420米。皇后陵园形制与帝陵陵园基本相同,但皇后陵陵园规模一般小于帝陵陵园。

① 河北文物研究所:《亶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文物出版社,1995年。

② 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辉县发掘报告》,科学出版社,1956年。

③ 河北省文物管理处、邯郸市文物保管所:《赵都邯郸故城调查报告》,《考古学集刊》第4集,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

④ 韩伟、焦南峰:《秦都雍城考古发掘研究综述》,《考古与文物》1988年第5、6期合刊。

⑤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临潼县文管会:《秦东陵第一号陵园勘察记》,《考古与文物》1989年第5期。

⑥ 《汉书·五行志上》:“永始四年六月甲午,孝文霸陵园东阙南方灾。”

⑦ 刘庆柱、李毓芳:《西汉十一陵》第174~175页,陕西人民出版社,1987年。

⑧ 焦南峰:《试论西汉帝陵的建设理念》,《考古》2007年第11期。

⑨ 秦中行:《汉阳陵附近钳徒墓的发现》,《考古》1976年第12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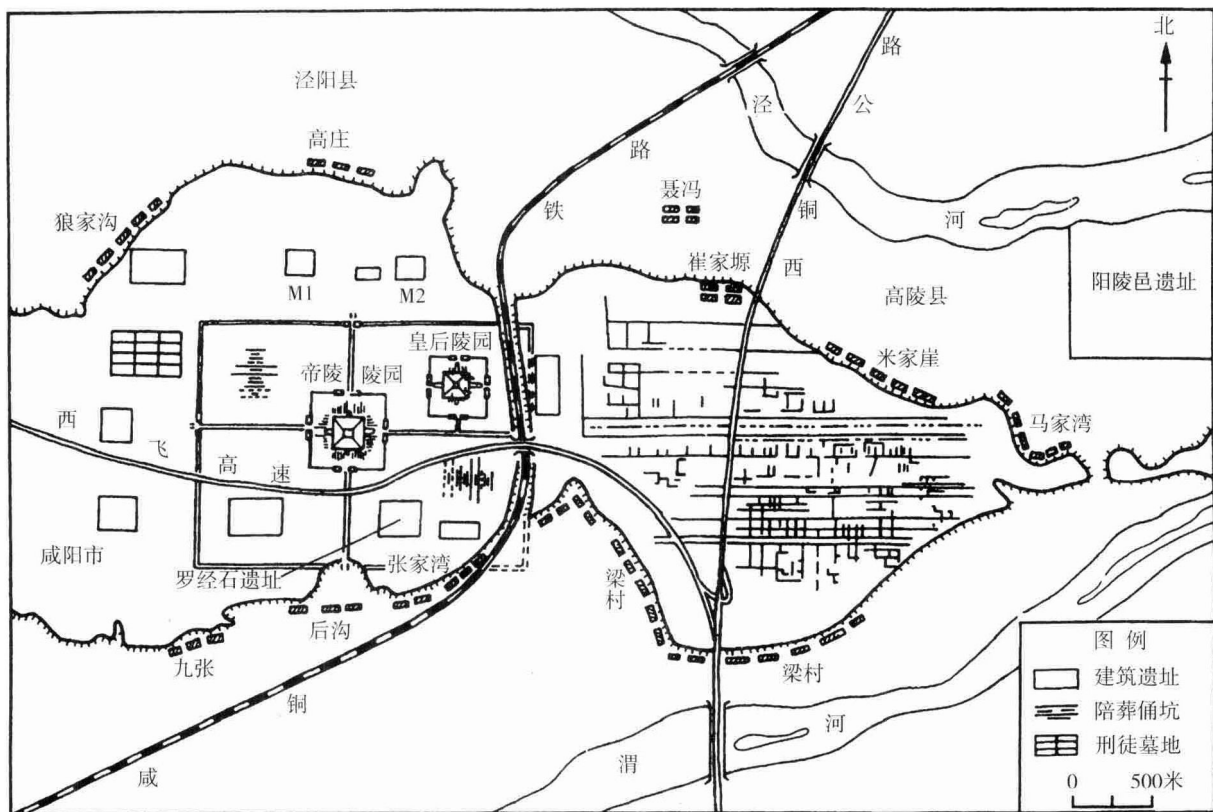


图2 阳陵陵区遗迹分布示意图（《考古》2007年第11期，第80页，图一）

如：孝景王皇后、孝宣王皇后、孝元王皇后陵园，边长分别为347~350米、334~335米、300米等。也有个别皇后陵园规模较大者，如孝昭上官皇后陵园（东部陵园）边长400米。

2. 帝陵、皇后陵陵园门阙遗址的发掘与研究

帝陵、皇后陵陵园四门称“门”^①、“司马门”或“阙”^②，它们与各自陵墓的四条墓道相对。同一陵园中的四座“司马门”，其形制、大小基本相同，但帝陵与皇后陵陵园“司马门”的规模、结构有所不同，前者规模较大、结构较为复杂。从西汉帝陵陵区和陵园整体形制布局来看，虽然帝陵陵园四座司马门形制、大小基本相同，但还是有正门与一般门之分的，而正门应为东门。

西汉帝陵与皇后陵陵园“门阙”形制有二，一为“台门”、一为“阙门”^③。已经考古发掘的汉宣帝帝陵陵园东门和北门、孝宣王皇后陵陵园东门、汉景帝帝陵陵园南门遗址，揭示出西汉帝陵与皇后陵陵园中的“台门”、“阙门”形制结构。两种门均为中央置门道，门道两侧为左右塾。“台门”与“阙门”主要不同之处在于：“台门”二塾之外为“配廊”，“阙门”二塾之外为“阙

① 《汉书·王莽传下》：“王莽遣使坏渭陵、延陵园门梁，曰‘勿使民复思也。’”

② 《汉书·五行志上》：杜陵“小于朝廷，阙在司马门中。”《汉书·五行志上》：“永始四年六月甲午，孝文霸陵园东南方灾。”

③ 刘庆柱、李毓芳：《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的探讨》，《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刘庆柱、李毓芳：《汉宣帝杜陵寝建筑制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中国考古学论丛》，科学出版社，1993年。

台”。属于“同茔不同穴”的帝陵与皇后陵陵园，使用同一形制的“司马门”。

(1) 西汉帝陵、皇后陵陵园的“台门”遗址^①

西汉帝陵陵园“司马门”中，考古调查发现属于“台门”类型的陵园司马门有汉高祖长陵、汉惠帝安陵、汉文帝霸陵、汉宣帝杜陵、汉平帝康陵陵园的司马门^②。这类陵园司马门已经考古发掘的有汉宣帝杜陵的帝陵陵园东门和北门遗址，孝宣王皇后陵园东门遗址^③。

汉宣帝帝陵陵园四门内侧，距陵墓封土边均为120米。四门大小、形制基本相同。门址面阔82~84米，进深20~22米。

汉宣帝帝陵陵园东门遗址保存较完好，东门面阔84.24米、进深20.36米，由门道、二塾和二配廊组成。门道居门址中央，门道两侧为门庭，二塾分布于门道和门庭左右。二塾左右为二配廊，二塾与左右配廊前后置廊道、卵石散水。门道宽13.2米，长17.4米，地面铺素面方砖。门道居中置木门槛，将门道分为大小、形制相同的内、外两部分。门槛左右为门墩，间距6.3米，二门墩形制、大小相同，均为一端与门槛相接，另一端与塾相连。二塾中部有一与东门平行的隔墙，将二塾分为内塾与外塾，此即文献记载的“一门四塾”。左右塾的内塾和外塾与左右配廊连接处各辟一门。门道两旁左右塾基址大小、形制相同，以右塾基址为例，东西15.3、南北9.75米。左右塾四壁置壁柱，每塾计有壁柱16个。配廊长26米，宽12.2米。配廊中部有隔墙，长与配廊相同，墙体夯筑，宽3.4米。隔墙东、西壁各有5对壁柱。左右配廊的隔墙延伸出与陵园墙相接（图3）。

孝宣王皇后陵园东门遗址，是西汉帝陵之中唯一进行考古发掘的西汉时代皇后陵园司马门遗址。孝宣王皇后陵园东门面阔67.8米、进深19.3米，由门道、二塾和二配廊组成。门道宽10.5米，长15.6米。门道两侧各有一门墩与左右塾相连。二塾形制大小相同，以左塾为例，其夯土台基东西13.65米、南北8.4米。左、右塾四壁置壁柱，每塾计有壁柱16个。二塾前后置廊，其形制、大小相同。左右塾分别与左右配廊相连，左右配廊对称分布于左右塾两边。左右配廊大小、形制相同。以左配廊为例，长19.5米、宽7米，配廊中部（东西居中）有隔墙，隔墙宽3.2米。隔墙将配廊分为内外两部分，内外廊形制、大小相同，各宽1.9米。左右配廊的隔墙各有6对壁柱，对称分布于隔墙东、西壁。左右配廊的隔墙延伸出与陵园墙相接。

从汉宣帝帝陵与皇后陵陵园东门遗址对比研究可以发现，它们之间的主要不同之处是：帝陵陵园东门的门道、门道与左右塾之间、配廊地面均铺置素面方砖，皇后陵园的同部位地面则均未铺砖，只是经过夯筑处理。帝陵陵园东门左右塾和配廊廊道之外置卵石散水，而皇后陵园东门的同部位则均不见卵石散水。在建筑材料使用上，以础石与瓦当区别最突出。帝陵陵园东门左右塾壁柱础石面高于檐廊地面，础石面加工细致、光洁如玉，形成“明柱”；皇后陵园东门左右塾壁柱

① 《礼记正义·礼器》：“有以高为贵者，……天子诸侯台门。”同书孔颖达《正义》又云：“两边筑闾为基，基上起屋，曰台门。”《十三经注疏》，中华书局，1980年。

② 刘庆柱、李毓芳：《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③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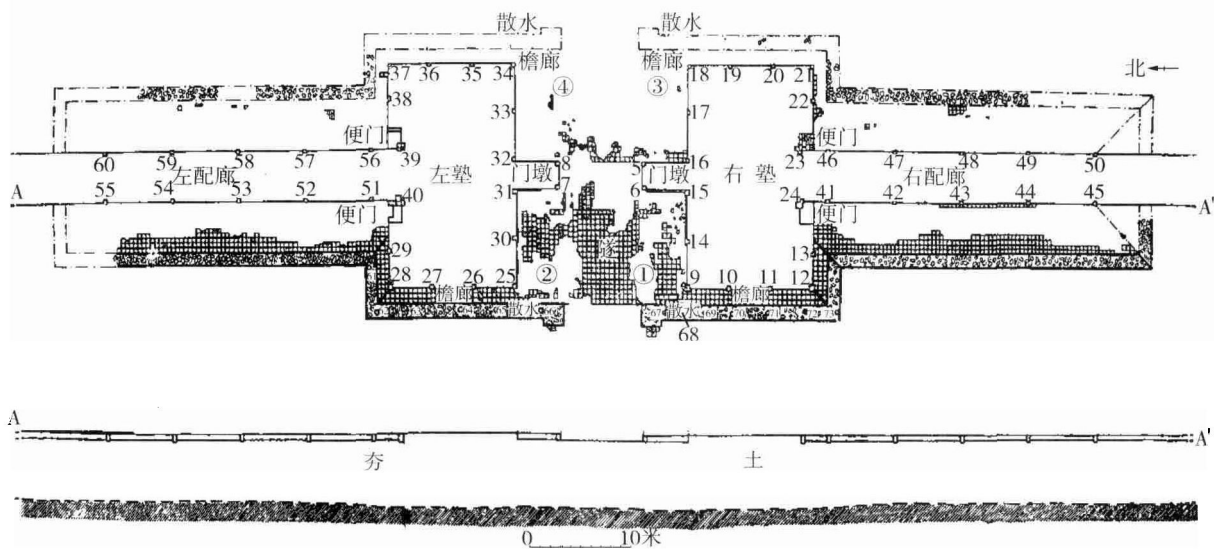


图3 汉宣帝帝陵陵园东门遗址平面图（《汉杜陵陵园遗址》第9~10页，图一）

1—60. 柱洞 61—74. 挑檐柱窝

为暗础。帝陵陵园东门遗址出土瓦当主要为“长乐未央”文字瓦当，“长生无极”文字瓦当和云纹瓦当所占比例甚少；皇后陵园东门遗址出土瓦当以“长生无极”文字瓦当为主。从帝陵陵园与皇后陵园司马门的门道、塾和配廊规模对比可以看出，前者远大于后者。

（2）西汉帝陵陵园司马门中的“阙门”遗址

西汉帝陵陵园“司马门”中的“阙门”类型有汉景帝阳陵、汉武帝茂陵、汉昭帝平陵、汉元帝渭陵、汉成帝延陵、和汉哀帝义陵的帝陵和皇后陵园司马门^①，这类陵园司马门已经考古发掘的只有汉景帝帝陵陵园南门遗址。

阳陵帝陵陵园南门遗址，北距帝陵封土东边120米。门阙由内向外对称分布有塾、主阙台、副阙台，二塾之间为门道。门阙面阔131.5米、进深25.2米。塾平面长方形，南北19.8米、东西10.7米。主阙台东西27.5米、南北8.2米，残高6.12米。主阙台台面南北居中位置，东西排列5个柱洞。副阙台东西19米、南北4米，残高0.4~4.3米。主阙台、副阙台均为夯筑台基，台壁涂朱。塾、主阙台、副阙台南北置廊及散水^②（图4）。

三 帝陵、皇后陵礼制建筑遗址考古发现与研究

西汉帝陵和皇后陵的礼制建筑主要包括寝殿和便殿组成的寝园及陵庙，此外还有食官等建筑。目前已经考古发掘的有寝园（寝殿、便殿）、陵庙遗址，关于“食官”建筑遗址还不清楚。经过

① 刘庆柱、李毓芳：《关于西汉帝陵形制诸问题探讨》，《考古与文物》1985年第5期。

② 焦南峰：《西汉帝陵考古发掘研究的历史及收获》，《西部考古》（第一辑）第289~303页，三秦出版社，2006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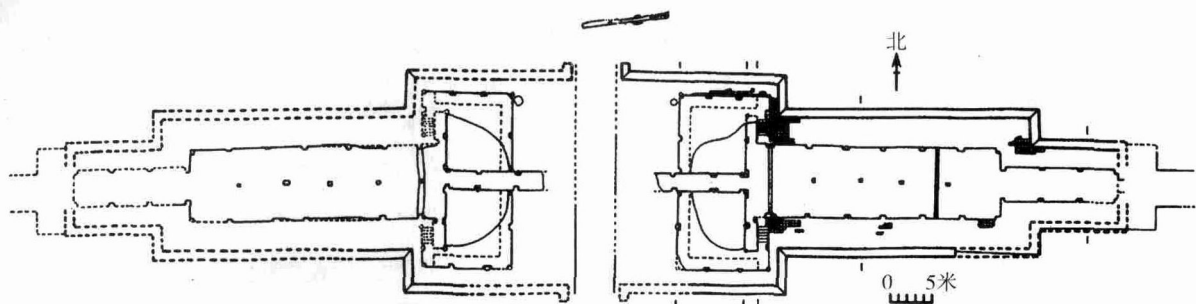


图4 汉景帝帝陵陵园南门遗址平面图（《西部考古》第295页，图七）

考古勘探、调查，在一些西汉帝陵附近，还发现了规模宏大的建筑遗址，它们有可能与帝陵、皇后陵礼制建筑有关。

（一）帝陵、皇后陵寝园遗址的发现与研究

文献记载，西汉时代的帝王陵及皇后陵、王后陵均置“寝园”^①，有的寝园遗址在近年来的考古工作中已被发现，如汉宣帝杜陵的帝陵、皇后陵寝园遗址、河南永城的梁孝王陵寝园遗址等^②。寝园是以寝殿为主体建筑，包括便殿的一组建筑群。建筑群周围构筑夯墙。西汉帝陵和皇后陵各自设置寝园。关于寝园在陵区的位置，西汉初年的帝陵寝殿建于陵园之内、陵墓之旁，《后汉书·礼仪志》载：“始皇出寝，起于墓侧，汉因而弗改”。如汉高祖长陵陵园勘探发现有大量建筑遗址，这些建筑遗址中可能包括有长陵寝园的寝殿、便殿遗址，大多分布在陵园北部，这与秦始皇陵园中的陵寝建筑遗址位置基本相同，后者大多发现于陵园及封土西北部^③。约从汉文帝霸陵开始，寝殿（或寝园）移到帝陵陵园与皇后陵陵园之外，但仍在包括帝陵陵园与皇后陵陵园的“大陵园”之中。这主要是因为帝陵陵园与皇后陵陵园之中安置了大量陪葬坑，如汉景帝阳陵的帝陵、皇后陵陵园之中的数以几十计的陪葬坑和规模宏大地宫，已经占满陵园，包括寝殿和便殿建筑的寝园不可能再建于陵园之中，而只能建于帝陵、皇后陵陵园之旁。已经进行考古调查、勘探、发掘的汉宣帝帝陵寝园遗址、孝宣王皇后陵寝园遗址和可能为阳陵陵寝建筑的遗址，多分布于帝陵、皇后陵陵园之外的东南部 and 西南部。

从考古发掘的汉宣帝帝陵与孝宣王皇后陵寝园资料来看，寝园中的寝殿居西、便殿位东。寝殿平面呈长方形。帝陵寝殿南北各置三阶，东西两侧辟门；皇后陵寝殿南面置一阶，北面设两阶，东西两侧辟门。便殿之内有多种使用功能的建筑设施，包括了庭院、居室、收藏主要物品的房屋、小型殿堂等。

① 《汉书·韦玄成传》：“昭灵后、武哀王、昭哀后、孝文太后、孝昭太后、卫思后、戾太子、戾后各有寝园，与诸帝合，凡三十所。”

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汉杜陵陵园遗址》，科学出版社，1993年；河南省文物研究所：《永城西汉梁国王陵与寝园》，中州古籍出版社，1996年。

③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全社会兵马俑博物馆：《秦始皇帝陵园考古报告（1999）》，科学出版社，2000年。